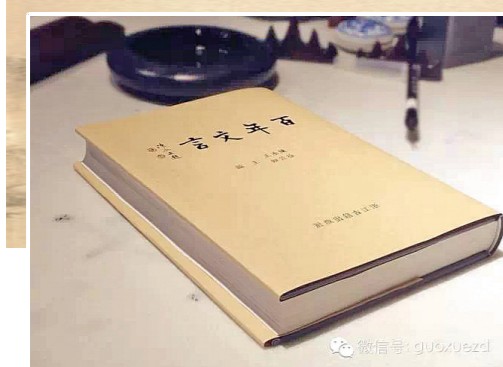


《百年文言》前言（三）

陈永正



《百年文言》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

文言文是中国三千年文化的载体，也是历史传统与现实生活之间的一根重要的纽带。这根纽带不能割断。学衡派中吴宓等人认为，文言文历史悠久，能通行两千多年，必然有其合理因素；不懂文言文，就无法了解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文言文属于精英文化，气质优美，精炼高雅。近百年来，文言文虽处在主流文化视野之外，但它对中国整体文化的发展仍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在二十一世纪，学习和创作文言文有什么现实意义呢？除了教科书中所说的内容之外，还应有以下几点：

一、传承高贵，促进社会文明。

文言文的世界，是一个以“君子”为人理想的世界。儒学，可以说是君子养成之学。君子，高尚尊贵，才德出众。历代的读书人努力进修，以君子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自省自觉，自尊自胜。中华是文明之邦，礼义廉耻，是古代贵族言行的准则，是孜孜以求的美德，是高贵的象征，是传统文化精神核心价值所在。君子立身处世之道，是“以天下为己任”的顶天立地的担当，故以“向上一路”指示人们，刚健弘毅，自强不息，仰山瞻日，努力去接近高贵与崇高。

文言，一种高雅典雅的语言形式，是传承高贵的纽带，它本身涵蓄着贵族礼仪的余韵流风，为社会各阶层提供取之无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力量，人们浸淫日久，智慧增生，气质变化，连仪表举止也“温、良、恭、俭、让”。有了高贵的精神和正常的伦理、人际关系和谐，社会健全稳定。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浅俗化的运动。文化虚无主义者以过激的手段摧毁了贵族精神、精英文化，也就从根本上损害了大众文化。要求所有人都向下看齐，而不是向上看齐，必然造成文化精神的大滑坡。《孟子·滕文公》云：“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人于幽谷者。”失去了向上的指引，大众失去出谷迁木的机会，也就不可避免日益堕落，严重地妨碍社会文明进步。

如今，人们已痛切地认识到这场运动带来的恶果，不少有识之士奔走呼吁，要传承高贵，重建社会精神文明。只有形成健康向上的文化价值体系，才能实现真正的长治久安。

二、提升审美层次，雅化白话。

古人常谓文章以体制为先，辨体，更是衡文的首要之务。体有尊卑之分，雅俗之别。而文言语言

与生活语言也有文野与精粗之别，只有加工、美化了的语言，才可提升为文学语言。“文”与“言”分离是正常的、必要的，即使在今天，白话文也不等同白话，白话文还需继续雅化。也许未来的白话文中，会形成“雅文”与“俗文”两种文体，如同文言与白话那样。

社会制度的变革和科学的发展，加剧了语言的俗化过程。时至今日，白话文的低俗化、痞子化已至极端。白话文要成为完美的文学语言，成为纯正的“雅文”，要在审美层面上提升，还得回过头来向文言文学习和借鉴。

白话文是文言文的后续与延伸。林纾云：“古文字，白话之根柢，有无安有白话？”梁启超认为，要作好白话文，“文言的功夫应该很深”，朱光潜也说：“想作好白话文，必要读文言文。”白话文由于易于易写，也更容易粗制滥造，失去文言的滋润，白话会变得枯干。好的白话文，须用加工、美化了的语言去制作。胡适所主张的“以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正是文言所长。

文言文惜字如金，简练如诗，是最精美的文字，也是最好的模板。文言文中不少词汇、典故，还可以继续进入白话，不断被吸收、融化。文言文遗留下来大量成语，已成了现代汉语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言简意赅，大大地丰富了白话文的表现力，提高了白话文的素质。这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须好好继承，更不应随意糟蹋。白话文今后的趋势虽然难以预测，作为当代文明的重要载体，白话文有着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任重而道远。我们还是希望未来的华语语言，可以更文明些、高雅些。

三、学习文言创作，继往开来。

近三十年，传统文化重新进入人们视野，大量古代文献整理出版，青年学子得以接触优秀的文史典籍。尽管是长期的隔阂，雾掩云遮，文言，依然是许多人心中的高洁的圣域，有志者还期盼着向上攀跻。如今，不少文学青年重新学习这种本已不太熟悉的文体，并试图创作文言文及诗词。当代人从小就生活在白话文无边的旷野中，文言，只是偶然入望的天际云山，在这种语境中成长的青年，要领悟文言独有的情调、语感，实在不易，学子们不妨多读一些文言典范之作，唤起历史文化的记忆，对传统文明产生认同感，并做一些写作练习，增强切身感受，丰富自己的语感，掌握基本的写作技巧。

当代的文化人，尤其是讲授和研究古代文史的大学教师，也应尝试用文言文写作。如果没有创作经验，缺乏感性认识，则如雾里看花，不知个中情味，所谓研究，也只能是掠影浮光，难以探微索隐。不关注、不实践文言写作，对于研究者自身来说，无疑也是一大缺失。正如钱锺书那稍有点尖刻的比喻，应羞于自己的无能为力。诗词创作需要天赋，不是人人皆可以为之；而写出合格的文言文，只要多诵读，多涵泳，自然水到渠成，没有学不会的。

学习写作文言文，第一步就是仿作。对前代优秀作品借鉴、吸收。吴宓云：“文章成于摹仿，古今之大作者，其幼时率皆力效前人，节节规抚，初似形似，继而神似，其后逐渐变化，始能自出心裁，未有不由摹仿而出者也。”摹仿，是学习最有效的手段，是所有文艺门类的初学者必经之路，未经这一步，在行家眼中，只是徘徊于门外的“爱好者”而已。

摹仿，宜取法乎上，先难后易。不要以为浅近的文言易学易写，便随意仿效，草草书成，一成一习，则难以自拔，再也不能深入古人的堂奥了。一人手就要摹仿古代的佳篇，无论是左、马、班、扬，还是韩、柳、欧、苏，只要是第一流之作，皆可作为范本。应以庄敬之心，逐字逐句体味古人的用心、用意，如陈寅恪所谓“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同一境界”，吟哦背诵，只有熟习文本后才能领悟其语感，诸如句字的平仄交互，字眼的“响”、“哑”，也须注意。

在这个过程中，要尊重文言文固有的程序规范，不应逾越。慢慢掌握词汇、句式、章法，然后才试行仿作。先精一家，再广为取法。吴芳吉谓“从事文学原不可以一家一书自足，其必取法百家”，实是个中入语。好的文艺作品，是由感情加上沉思而创作出来的。没有感情，则不足以动人，没有沉思，则未能深刻。

文言文，由于其语言上的特性，成文较慢，则更宜于沉思。遣词造句，有如沙里淘金，细细选择最宜于表达感情的词汇，力求优雅精微，曲深势秀。写作过程也是与古人对话的过程，努力去领略汉风、唐韵、宋意，感悟古人的文化品格与伦理精神。

文言文有多种体裁，各有其不同的语言形式、表现形式以及审美形式，学者须细加揣摩，掌握各体的特色。古时文体分类体例不甚统一，如《明文海》分体二十有八，每体之中，又各为子目。清《古文辞类纂》则分为十三大类。大抵最要者有论辨、传状、碑志、赠序、书牋、序跋、杂记、箴铭、庆吊等，各有功能。

进入民国后，文言文使用范围显著缩小。到了当代，就只剩下序跋、书牋、杂记、碑文几类较为常见，其余的多已弃置不用了。文言文又有散文与骈文之别。骈文是一种很特异的文体，在乎散文与骈文之间，字句整齐匀称，讲求声调韵律，多用四言六句，故又称“四六文”。文至骈体，可谓已臻形式美之极致。

唐宋以还，有所谓散、骈之争，即古文与时文之争，势同水火，各不相让，虽然如此，却不似后世之文、白之争，拚到你死我活为止，不少古文家能作四六偶偶之文，骈文家亦能散体。骈体文与散文文，同途异辙，已历千年。当代虽有热心人鼓吹写赋与骈文，作品极多，佳者则罕见。“能观千赋，而后能赋”，今之所谓赋家，谁能解此？

笔者相信，喜好文言，往往是出自本性，出自天然。也许，“保守”思想是与生俱来的，文言文似更宜于表现人群中这小部分人的精神世界。既然爱上了它，就应该努力去做到最好。辜鸿铭云：“语

言要高雅，表达要自由，用字要简练，意义要完满。”今天写作文言文，也应以此为追求的目标。

时至今日，文言文依然有它的生存空间。刘梦溪说：“文言文有什么好处呢？文言文能保持文本的庄严。”并认为重要的文告、外交文献，都可使用一些文言文语词和体式，“适当地使用文言文，不是一件坏事。甚至国家的重要文告，略增一点文言文的话，国家的威信都能提高一点。别人会认为你是一个有文化的国度。”

文言是一种典雅的文体，在某些特定范围、特定内容、特定语境内仍难以被白话文取代。如致祭祭文、黄二陵的祭文，殿堂新建、古迹重修的碑记，相信用文言文会显得更庄重严肃；某些学术门类，如中国古代文学、历史、东方哲学中某些著作，也宜于用文言文撰述。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熊十力《新唯识论》，假如采用白话的话，肯定会大为逊色。新编《清史》，若用文言，则可与传世《二十四史》的语言风格统一。

此外，如诗文书画的序跋题记，带有私隐性质日记、书信等，一用文言，便生雅韵。一些实用性文体，如公文函件、揭帖广告、契约请柬，以至展品产品的说明书，适当使用文言，自可提高其文化品位。

网络时代，为文言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互联网提供了展示作品的平台，近年来，时见有文言文在网上发表，从文章水平来看，虽然多数还处于习作阶段，但可见证这一古老的文体已被部分年轻人所接受，并尝试撰制。其中亦有较成熟作品，体裁、题材都多式多样。此外还有大量的微博，篇幅短小，言简意赅，除了创造性的词汇外，文言文词得以复活并大量使用，个别版本亦偏好文言。手机及网上流传的段子，时以骈偶句式，活用成语，带有浓浓的文言成分。

当代文言，也许会分成改良派与传统派两路。梁启超所创的“新文体”，开了改良文言的先河，学衡派的胡先骕等也曾提倡文学改良，章太炎、傅斯年等人主张文言合一，文白交融，为适应现代人的习惯，以白话思维代替传统的文言思维。改良的文言文还是文言文。将来的改良派也许会沿着“新文体”及学衡派路子，文言句式夹杂白话句式，不避新词汇及俗语。传统派文言，是正宗古文，即以文言思维，并以文言句式为主体的文言文。如同要写好外文，必须用外语思维那样，要写出纯粹的文言文，也必须用文言思维。先用白话想好，然后用文言文翻译，只能制作出夹生的文字。

如今，更有学者提倡所谓的“现代文言”，要在改良派的基础上进一步浅俗化、口语化、生活化，让一般人都能看得懂，以利于普及和传播。这只是一厢情愿而已。无论是以“文言为体，白话为用”好，还是以“白话为体，文言为用”好，这种半文不白的写作，只能是低层次的现代仿古古董，它失去了传统文言的最主要的优点，如高贵、庄严、典雅、精炼，又难以与更通俗的白话文抗衡，真正的行家不屑于读，大众读者看去也似懂非懂，高不成，低不就，非但不能挽救文言文濒危的命运，反而使它失

去赖以幸存的基石。文言文美好的躯壳不复存在，文言文生命也就真的完结了。

文言文早已定型，是一种遗产，不可能进行改革。所谓改革，只能是调和，是俯就，是俗化。文言文的“现代性”，只在于文章的思想意义，而在其形式、技巧上的通俗性。

笔者主张，应学习和创作能与传统衔接的“纯粹”的文言文。今后正宗的文言，应该有典雅的语言，高尚的格调，穿越古今的文化情怀，古色古香的生活气息。少数人写，少数人读，以维系斯文一脉，断而复连，危而不坠，这已是最大的愿望。所谓“复兴文言文”，不必要也不可能。文言，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必然是个人和小众的，不可能为全民服务。它难以复兴，也不会消亡。

在今天，属于大众的文化已不少了，荧幕上的升平歌舞，欢声笑语的二人转和大腕相声，手机里的杂色段子、小报满版的明星轶事、警匪、帝王片，各式各样的武侠、言情小说，梨花体诗，含泪的散文，这都很好，很好。把诗词、文言文、古琴等早已被弃置的东西留给小众，恐怕也不为已甚吧。相信社会群众有足够的度量，能容忍这类小众文化的存在。

现当代文言文如同诗词一样，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本来，是否使用文言文撰作，纯属个人的文化取向，应得到他人的尊重而不是妄加指责。当代文化教育界中，尤其是语言文字工作者群中，也许是源于某种自卑、自虐的心态，对文言文鄙夷、敌视、攻击的不乏其人，横加以“腐朽的旧文化”、“复古主义逆流”、“时代落伍者”种种罪名，叫嚷着要彻底否定和扫荡，但却很少人冷静下来，对近百年的文言文这一不容忽视的文化现象进行深入的学术探讨。即使偶有研究者，也往往认为现当代文言思想文化是“顽固保守”的，不合时宜的。没有对大量作品进行微观的审视、钩稽排比，概括探究，探求其艺术的内部规律性，也就不可能进行宏观的和抽象的理论研究。

亦有论者认为，语言决定思维，文言与荒谬的思想必然是“融合为一”的。这种偏见至今犹未消除。历史经验早已证明，用白话文去传播荒谬的思想，其危害性远比用文言文文大得多。

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慨叹：“吾知百年以后，世事变迁，是非经久而论定，意气阔而平心，事过境迁，痛定思痛，必有沉吟反复于吾书，而致哀于天下神器之不可为，困于天地之必有与立者。”钱先生所感甚大，事过已近百年，说真的，笔者从未认识到旧文化与国家兴亡有多大的关系，更无法一一理清文言文盛衰的前因后果。

在当代社会文化生活中，没有文言，没有诗词，没有一切旧物，也无妨大局，芸芸众生依然可以鼓腹讴歌，颂平鸣盛。在物欲横流的时代，滔滔浊浪之中，偶然飘来几瓣落花，唤起人们一些凄美的回忆，也许就够了。希望这个选本，能起到启迪心智、激发美感的作用。

我两次借调到教育部的经历

生命科学学院 退休教授 原同位素研究室主任 刘振声

我于1975年和1978年先后两次被借调到教育部，进行短期工作。1975年正值邓小平同志第二次复出工作，在文革极左思潮影响下，社会上“读书无用论”盛行，对文化教育战线影响尤甚，甚至一度使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处于崩溃边缘。邓小平同志上台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拨乱反正，重点从文化教育领域抓起，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教育部随即从全国各重点大学抽调了一批教师，组成调查队，对文革以来我国的文化教育状况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为恢复高考从而恢复正常的大学招生及人才培养工作做好准备。

我们主要是到北京、清华大学、通过访问学校领导、教师和学生，调查“工农兵大学生”的学习情况及效果。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发文（中发[1970]46号）——“中央同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当中写明：学生录取条件首先是政治思想好，二是实践经验，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还要招收一些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且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招生办法：“废除修正主义的招生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

文件下发后，当时许多大学都招收了工农兵学员，但由于学员间文化水平差异很大，教学上都面临许多障碍和困难，加上还要花去不少学工、学农、学军的时间，且本身学制短，只有三年，所以这些学生真正用于学习文化知识的时间不多，大大地影响了真正高水平、高素质人才的培养，群众意见反映也比较大。

虽然如此，工农兵大学生的培养，也为文革期间大学多年停止招生，给国家文教事业的发展停滞及人才培养断层的状况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弥补作用。少数工农兵学员毕业后通过读研及自身的不断努力刻苦奋斗，也逐渐成长为优秀人才。总的说来，这次调查研究为文革结束后，国务院

批转教育部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的意见（国发[1977]112号），恢复全国统考，择优录取的招生办法提供了理论依据。1975年秋，由于“四人帮”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及“批林批孔”运动，我们只能各自回校。由于我们在教育部工作期间，常与中山大学党委（当时李嘉人同志任党委书记）联络，通报一些新情况，在学校举办的批判会上，还有人点名地批判我泄密，但因没有什么真凭实据，所以我幸运地没有受到多大冲击。1978年，我第二次被借调到教育部，参与筹备我国1978年科学大会。我们深入到科研机关和高等院校进行调查，了解专家学者在文革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发现不少专家、学者虽然在文革中饱受抄家、游行、批斗，甚至有被关进“牛棚”的遭遇和冲击，但为了祖国的科学事业发展，仍然默默耕耘，在艰难的条件下取得优异的成绩。如我校昆虫研究所所长蒲蛰龙院士和他领导的团队，产、学、研结合，从实验室到四会县农村的实验基地，进行生物防治的深入研究。除了亲自在实验室和进入田间进行实验、调查外，还为基地培养了大批生物防治的技术人才，扩大了实验范围，为水稻的生物防治，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和贡献。蒲蛰龙院士被誉为“中国生物防治之父”，其生物防治的科研成果，获得了我国1978年科学大会奖。

我生物学遗传学教研室李宝健、林月蝉等老师从整体、细胞和分子生物学水平上对“作物三系”生物学特征”进行深入研究，当时我也参与其中，利用先进的科学方法，如原子核示踪技术，采用放射性14C标记氨基酸，对“作物三系”进行标记研究，再用电子显微镜放射自显影技术，对袁隆平院士发现的“作物三系”，水稻的可育与不育系植株对物质合成差异的理论基础开展研究，为“作物三系”理论在农业上的实际应用，提供了理论依据，其成果也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谈谈艺术的“距离”问题

历史学系 李毅琳 陈非凡

既有隔，又相连。窗外，翠叶藏莺惊倦眼；屋内，灯下敲棋，窗前展卷，美的享受自不待言。

“碧纱秋月，梧桐细雨，几回无寐。”人在室内，透过绿色的纱帐，可以看到外面秋夜完满的月亮。透过“纱”看月，在视觉上有一个很特殊的迷离的效果。“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阑倚。”“高楼危阑”给景物、心灵与感情上提供的空间感，让执著与激情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平复——“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隔”，为自然景观与心灵创造的空间感，使我们离开物象的焦点，走近一些，阻断一些，过滤因景色繁复而形成的负累，心无挂碍，更能体察美的经验。

距离与我同一

我们说美学源于哲学，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哲学家把所有的区分忽略，去追溯世界的本源，而艺术家则把所有的分别忽略，如朱光潜先生所说：“专以情趣为标准，重新把这个世界的颜色、形状和声音组合成条理来，另成一种较可喜的世界。”

从哲学的角度看，“物无非彼，物无非是。……故曰莫若以明。”在庄子看来，世间万物并非彼此之分，道通为一。因而应当以明净的心境去关照事物的状况。庄周梦蝶，恰是说明以无我为枢，以物化为环，世间万物皆可进入“我”之中。美学亦同理，纯粹的直觉中没有自觉，只有在纯粹的直觉中，我的生命和物的生命才能往复交流。

物我合一也即“移情”，是中国传统审美思想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宗白华先生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中谈到，意境就是指化和心源的合一，是一切艺术的中心。在情景交融中，可以层层挖掘更深的情与景，从而展现一个独特的宇宙境界。艺术意境的诞生，归结起来，在于人的性灵中，中国人通过艺术创造了心灵的微妙境地，而这种微妙境地，又是从凝神寂照的体验中涌现出来的。意境共有三层：直观感相的渲染、生活活跃的传达、最高灵境的启示。既要缠绵悱恻一往情深，又要超旷空灵，超以象外。而“以道光照影之心，写通天尽人之怀”，更是中国艺术的最后理想和最高成就。艺术境界使得心灵和宇宙净化和深化，使人在超脱的胸襟里体味到宇宙的深境。意境的

高、深、大，最终仍植根于一个活跃的、至动而有韵律的心灵。

一言以蔽之，作为创作者，要与这个世界达到物我同一，才能创造出具有意境的佳作；而作为欣赏者，则要与艺术作品达到物我同一，才能领悟作品的真谛。

距离与实用性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谈道：“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皆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客观之诗人”需要描摹纷繁复杂的世界，“主观之诗人”则更多的需要表达敏感的心境，如此，则越接近赤子之心越好。合而论之，则艺术与现实社会的距离的把握须自有一番审视。

艺术与实用世界保持“若即若离”似乎更好。从创作的角度看，无论是要返照人生还是反观社会，创作者要与自身的情感留出距离，不可落入世俗的圈套，这样才能站在更高的位置从中揭示出更为深远的意义。而从欣赏者的角度看，好的欣赏者当置身局外，不为实际的欲念和情感压倒感；而置身局中的欣赏者往往会失去与物应有的距离，失去欣赏的态度，回到实用的态度。

“余谓一切学问皆能以利禄动，独哲学与文学不然”，王观堂先生认为，“辅缀的文学，决非真正之文学也。”这里，“真正的文学”侧重的正是艺术和审美的功能。但回望20世纪，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却正如谢冕所说，是一个“辉煌而悲壮”历程。

近现代中国充斥悲哀与苦难，文学就不断描写和传达着这样的苦难与悲哀。因此忧患是她永恒的主题，悲凉是她基本的基调，“有用”成了文学沉重的负载。文学所背负的使命，限制了她在单纯美学意义上的体现，成为了社会的“呐喊”与“药”，她们正像鲁迅所说的“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并且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从而无不腐朽，直至“星火燎原”。可同时，我们也产生了“彷徨”；文学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重功利而轻审美，扬理念而抑性情，艺术性也随之消减。

艺术的距离，把握好“距离”也是一门艺术。